

追尋政治外交檔案中的「移民」身影：以近期公開的澳洲華裔檔案為例

郭美芬 澳洲拉特博大學社會科學院暨澳洲研究委員會博士
後研究員

一、前言

近幾年來隨著數位化科技與全球史觀的發展，各地區紛紛開放其歷史檔案以擴大研究的範疇，通過網際網路與數位資料庫，我們現在能夠跨越國家與地區的地理隔閡，使用各地開放的數位檔案，而不必耗費時間與精力到各地去蒐集史料。這一發展也為研究海外移民的歷史，開啟了新的契機。在剛剛開始數位化海外華人歷史資料之際，王賡武教授曾經提出研究華人移民的挑戰在於歷史研究者蒐集資料的方法與態度，儘管各地史料數位化的成果與合作，已經增進了近代移民遷移的歷史背景、事實、統計數據等正式與實用性的史料，但王教授認為另一描述近現代移民者離家冒險、認同轉向、文化衝突等心路歷程與感情的表述史料，時常被疏忽保存與歸檔，缺乏這類的資料，我們對於華人移民的歷史理解就不能完整。（註1）在數位化時代，史料與檔案的蒐集與建檔方法較之過去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如同王教授所提出的，治史態度更是影響研究與蒐集海外移民資料的關鍵，尤其是那些透露了在複雜處境中移民者的夢想、憧憬、挫敗、渴望等豐富經驗的資料，更值得歷史研究者花費心思去挖掘、關注與保存。

本文將從近年來開放的有關二十世紀早期澳洲華裔歷史資料為例，除了藉此機會介紹近年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澳洲拉特博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雙邊數

位化移民歷史資料合作歷程外，也將舉例說明，政治、外交等檔案不僅僅提供大時代的歷史敘述，也可以幫助我們探究移民者個人與家庭的社會處境、個人生命歷程與認同變遷。跳脫舊有的「華僑」思維，我們方能理解近現代歷史中人群遷移與社會文化交融中，那些複雜而富有趣味的歷史面貌。

二、數位化合作歷程與檔案簡介

澳洲華裔歷史資料的數位化國際合作計畫歷經數年以及多方的努力，目前已經有初步的成果。2006年起在已故的陳民熙（Henry Min-his Chan, 1937-2008）與費約翰（John Fitzgerald）教授的協助下，雪梨與墨爾本兩地的國民黨黨部陸續獲得學術界人士、澳洲聯邦政府與當地州政府的補助，得以初步整編存放在其黨部的歷史資料。而能順利開放兩地國民黨黨部史料的首要因素，應該歸功於司徒惠初先生與前澳洲聯邦參議員陳之彬先生的居中協調與幫助，方能促成兩地黨部決議開放史料供研究之用。而2010年Judith Brett教授、James Leibold博士和我獲得澳洲國家研究委員會的研究補助，計畫以收藏於兩地黨部的歷史檔案為主，輔以其他官方資料、民間家族書信以及口述訪談等，進一步擴大歷史研究的範疇，深究二十世紀上半葉澳洲華裔社群的政治社會變遷。而在考證這批檔案的過程中，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給予了許多學

術上的協助與諮詢，2010年底近史所黃克武所長與張力教授連袂參訪墨爾本與雪梨，更進一步促成雙邊達成協議，進行掃描檔案的國際合作計畫案。（註2）

目前合作掃描的檔案與資料共分為四部分：清朝與中華民國駐墨爾本領事館檔案、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與墨爾本分部檔案、民間家族書信以及澳洲華文報紙，下面就針對這幾項檔案簡要說明：

清朝與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總領事館辦公一直都在墨爾本，直到1929年底才搬遷到雪梨，然而相關的檔案跟文件並未隨之搬離墨爾本辦公室。而墨爾本方面，因為財政拮据導致有幾年的時間並未派遣領事也未設置辦公室，總領事館的文件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才被移送到了墨爾本唐人街上的中國國民黨美利濱黨部。1939年駐墨爾本領事館復館，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前後，領事館的財政收入跟行政運作時常必須依賴黨部的協助，也因此從1940至1950年代墨爾本領事館的部分文件還是存放在黨部，直到1950年代墨爾本領事館的運作上了軌道後，領事館的檔案才依照外交部行政組織法自行管理。

存放在中國國民黨美利濱分部的「駐澳大利亞中國領事館檔案」，很慶幸地得到妥善的保存，依據初步的整編共有164份卷宗，經過數位掃描後整理初約有37,000筆左右的文件。這部分的檔案有百分之七十為原始手稿，其他則為公文以及書信副本，分

別出於 15 位總領事、代理領事、領事和副領事，歷經清朝、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以及遷臺時期。

總領事館檔案內容包含與中國、澳洲政府間的官方公文書信來往，澳洲華人與商號聲請簽證、護照、商業貿易等案件以及各項陳情，尚有小部分為出版品、護照範本以及相關照片等資料。檔案的原始保存狀況，反應了當時領事館的文書處理方式，在官方公文書信方面，保存狀況較為良好，信件並依照中英文方式編號裝訂成冊，唯因年代久遠，已經有部分受損的狀況。另外，一般來信的檔案，較公文書信混亂，雖也以中英文方式編排，但是多為散落不齊，佈滿污穢皺摺以及蟲蛀受潮現象，狀況不比公文書信檔案來的整齊。而 1939 年到二次大戰結束前後墨爾本領事館的部分文件與檔案，又呈現另一時代下駐外領事館辦公文化的面貌，這批檔案都是以金屬夾針裝訂方式，許多文件散落，缺乏有系統的整理。

我們在與近史所檔案館商議如何整編與掃描這批史料的過程時，考慮到這批史料的存放與歸檔方式可以看出當時駐外領事館的行政運作，是以在建立檔案目錄與掃描順序時，都盡量保存原先檔案文件的存放與歸檔順序。此外，我們也整理出檔案的書寫語文跟涵蓋的年代如下：

經過考察，目前澳洲國家檔案局中與中國總領事館相關的文件，多為 1930 年代之後；而收藏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外交檔案也

檔案書寫語文

語言	數量	百分比
中文	86	52.5
英文	32	19.5
中英文並列	46	28
總數	164	100

檔案年代統計

年代	數量	百分比
1900s	10	6
1910s	57	34.7
1920s	44	26.7
1930s	30	18
1940s	22	14
1950s	1	0.6
總數	164	100

集中在 1930 年代之後，主要原因是 1908 年到 1928 年間中國政治局勢混亂，南北政府交戰下，許多檔案都已經散失。是以這批收藏於墨爾本國民黨黨部的 1908 年到 1929 年間的領事館檔案將可能是目前唯一較為完整的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領事館檔案，也因此可以預料這批史料未來將成為研究華裔社群歷史相當重要的一手史料。而 1940 到 1950 年代間的檔案，雖然規模較小，但也將有助於補充目前中華民國外交部與澳洲政府在 1940 年代的來往，更重要地是，這批史料可能提供了考察墨爾本領事館重新運作後如何影響當時澳洲政治與社會從對

歐陸的認同轉向亞太區域的關鍵時刻。

再者，收藏於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暨南太平洋群島」的檔案為本計劃第二大大宗的檔案類別。經過整編後的文件，不包括出版品、歷史文物及照片，這批檔案共有 476 卷宗，卷宗收藏年份從 1915 年起至 1960 年代。此批史料收藏了二十世紀前半葉國民黨在澳洲以及南太平洋上 35 個分支的紀錄，檔案展開後約長達 11.8 公尺，經整編後共有 479 份卷宗，內容多為總支部對外書信、各支部及私人來函、大洋洲各地會員名冊、財政報告、開會記錄、剪報書籍、出版刊物及捐款名單等。這批史料的年代多半集中在 1920 至 1940 年代，而文件的內容則以會費以及書信往來為主，請參見下表的簡單說明：

檔案年代統計（以較重要的檔案為主）

年代	數量	百分比
1910s	13	3.16
1920s	99	24.09
1930s	63	15.33
1940s	113	27.49
1950s	45	10.95
1960s	9	2.19
1970s	3	0.73
1980s	34	8.27
1990s	28	6.82
2000s	4	0.97

檔案分類

類別	數量	百分比
捐款及會費收入明細	88	26.27
公文及私人書信	77	22.99
財務檔案	38	11.34
各界委員會選舉檔案	33	9.85
會員名冊	28	8.35
各式證書	26	7.76
會議記錄	23	6.87
各式收據	22	6.57

而收藏於墨爾本的中國國民黨美利濱分部的 56 份檔案，及 114 份印刷品，檔案規模較小，多為 1930-1960 年代間美利濱分部及維多利亞支部會員名冊、開會記錄、書信記錄以及各式收據。印刷品收藏較重要的有數十本五四運動時期出版的報刊、進步雜誌，及外交部、僑委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教育部、新聞局等發行的印刷品。

截至目前為止，依舊鮮少有澳洲華裔社群組織對外開放其如此龐大而珍貴的收藏，檔案在初步整編後發現內容涵蓋了澳洲華裔社群對於公共議題包括性別、經濟投資、社會網絡、文教動員、慈善募款、政治認同等相關活動與討論，展現了此批史料所涵蓋的多元面向，也因此將成為未來研究澳洲華裔社群內部政治派系的重要一手資料。此外，這批檔案也將開啟研究澳洲華裔政治團體的運作、當地社會和中國政局間複雜關係的大門，加上這批資料很可能是在中國及臺

灣之外，最大宗的關於二十世紀初中國國民黨海外組織的文件，其重要性有待學者進一步深究。

2011年底以上兩大宗的文件都已經掃描建檔，影像數量初步為領事館：36,969頁，總支部：65,623頁，墨爾本黨部：28,654頁。在我們合作掃描上述兩大檔案時，更獲得澳洲兩個華裔家族：雷妙輝與卞鳳年後代將其商業書信、私人文件與資料提供研究之用，這批家族資料是這次合作計畫中的第三項檔案類別。雷妙輝家族的澳洲商號，與二十世紀初香港、上海、東南亞等地的百貨業、進出口貿易商號和總商會來往密切；而卞鳳年則在二次大戰前後被派駐雪梨擔任中國銀行經理，其父親卞白眉為中國二十世紀初著名的銀行家。儘管這兩大家族的書信資料僅是零星片斷，但卻佐證了近代移民家庭的遷移經驗與政治、外交、經濟等外在環境間的聯繫密不可分，我們也希望藉由這兩份家族檔案的拋磚引玉，未來可以納進更多近代移民家族的史料。

澳洲華裔的另一重要歷史資料為十九世紀末到二次大戰前出版的四份華文報紙，這部份為此計畫的第四項檔案類別，在近史所的協助下，也已經初步完成掃描。華文報紙所提供的訊息跟報導重要地提供我們在考察上述三類檔案時的依據，更重要地是，這些報章還透露了不同移民社團間的關係、動員跟結社，以及在政治社會變遷中，移民者的生命歷程、他們的野心、挫敗與憧憬等等

鮮為人知的心情。

三、檔案應用舉例與未來展望

儘管目前檔案已經完成初步的掃描，不過未來更亟需建立一個整合的研究平台，讓這批檔案能更有效地被研究與應用。近期掃描的澳洲華裔歷史檔案在初步的整編過程裡，我們發現至少可以提供三個學術研究的方向，首先是有助於理解二十世紀初移民政策對於個人生命歷程與家族遷移的影響，再者提供了研究近代中國與澳洲兩國間，政治外交與經濟貿易關係的一手史料，最後，這批資料有助於描繪二十世紀初華裔社群在澳洲、南太平洋群島、香港、上海、日本、美洲與東南亞等地區，經由商業、政黨結社和新聞報刊所建立起的移民網絡。

此外，我想趁這個機會舉例說明在數位化時代中，如何透過大量的政治外交史料，尋找移民者的歷史經驗和生命歷程。讓我再回到王賡武教授的文章，文章中他舉例了一位華裔朋友的認同抉擇，反應了外在現實環境對於個人抉擇的影響，可能遠遠超過對於現代中國的孺慕之情。王教授描述牽動這位朋友中國情結的主因來自於他對一位上海姑媽（郭婉瑩）和其家族（永安百貨郭家）的讚譽，這位上海姑媽和其家族象徵了一個繁華、進步與跨國的現代中國，而這位上海姑媽的父親郭標，正是澳洲回到上海的移民代表，我就以我們目前這批數位化的檔案為

例，來說明即使郭標沒有留下任何隻字片語的史料，但我們可以從政治外交報紙等史料中，描繪出他的移民經驗和歷程。

郭標 (George Bew, 1868-1932) 十九世紀末在雪梨發跡，1917 年回到上海後成為永安百貨公司的總理與監督，與孫中山、蔣介石與宋子文等國民黨要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前後出任華僑聯合會、南洋煙草公司及中央造幣廠等要職。數年前我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時，發現「郭標」的名字時常出現在當時的澳洲華文報紙中，他游走於不同的商會、教會與政治結社網絡中，涉入的公共事務也相當廣泛，然而，當時資料蒐集不易，直到最近幾年來，透過澳洲、臺灣、香港跟中國地區國家檔案、地方報紙的數位化，加上雪梨國民黨資料開放後，郭標的移民歷程才逐漸地清晰。

郭標於 1890 年代原是雪梨街上一名販賣蔬果的小販，後來與同鄉的親戚跟朋友籌資建立了一個販賣香蕉的「永生果欄」，當年雪梨的都市化發展和華人長老教會的幫助，影響了他的人生、事業和價值觀，也引發他對於公共事務的興趣，1899 年他加入保皇會，並且與同鄉的親戚開始擴展其果欄的生意，短短數年間永生果欄已經壟斷了新南威爾斯州絕大部分的香蕉生意。1908 年前後他退出保皇會，1911 年底加入支持孫中山革命黨人與共和政府的「少年中國會」，而近期公開的檔案跟資料則顯示，郭標在昆士蘭州、新南威爾斯州及斐濟 (Fiji)

等地的商業網絡，奠定了後來國民黨在澳洲及南太平洋群島地區的成立基礎。

跨越傳統的同鄉情誼與商業人脈，「政治」或是說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在 1911 年後成為移民社群內部嶄新的動員言論，1913 年底到 1914 年初，雪梨華人教會、商業網絡和洪門底下的義興公司正式合作結盟，以公司合股的方式，進行募捐，建立雪梨第一份超越鄉黨、商號，以支持孫中山與中華革命黨的華文報紙。這份報紙的幾位創辦人包括郭標在內，於 1915 年建立雪梨國民黨 (Chinese Nationalist League of Australasia)，公開支持孫中山與廣東政權，與當時由北洋政府派任來澳洲的總領事對立，郭標更擔任第一任雪梨國民黨部長，並將經營商業的方式援用到政治結社中，吸引了許多黨員的加入，而他受到澳洲影響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與習慣，也連帶著影響了國民黨在澳洲的政治文化。

一次大戰結束前，郭標決定舉家遷移到上海，擔任永安百貨的總理，然而他跟澳洲地區的聯繫，始終未曾斷過。目前臺灣與中國兩地數位化的檔案、資料和報刊中也逐漸可以窺見郭標在上海如何運用同鄉會、教會、商業網絡與政治人脈關係，將其社會影響力擴展到極致，他們在澳洲的經驗也時常被援用到上海等地。例如，在上海的澳洲華僑援用了雪梨醫院的募款方式，以上海小姐為噱頭，結合社會慈善與商業網絡，成功募得籌建中國第一座癲瘋醫院的款項。郭婉瑩

在她的書中雖然提及她的姐姐當選第一屆上海小姐，但是並未多加著墨她的父執輩如何在二十世紀初成為跨國的商人，在她描述西化的生活方式與遷移的經驗文字中，沒有被提及的是其父執輩在上海、香港乃至於澳洲等地的社會影響力，他們集資建立了百貨業、學校、教會、新通訊科技等，企圖將在澳洲耳濡目染下習得的都市化經驗，帶往中國，他們是相當早期的跨國遷移者，而現今開放的資料與檔案，正好讓我們有機會去理解他們的憧憬、夢想和動員能力。

郭標的歷程和生命經驗僅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可以從近期開放的政治外交等檔案中耙梳出澳洲華裔移民的身影，他的生命歷程彰顯了一個時代的縮影。而他所參與的永生果欄、百貨業、長老教會與國民黨，更在二十世紀初協助了許多華裔移民家庭、學生、傳教士、新聞記者以及中澳雙邊黨政人士的來往交流，這些過去不為人知的故事跟歷程，隨著檔案的開放，相信未來會豐富我們對於近現代海外移民的認識。澳洲和紐西

蘭地區華裔歷史研究或許才剛起步，遠遠不及美國以及東南亞地區的海外移民研究成果，不過，數位化技術的影響與合作，或許將替此區域的移民研究開啟新平台與新觀點。

【註釋】

1. Wang Gungwu, "Mixing Memory and Desire: Tracking the Migrant Cycles" in Tan Chee-Beng, Colin Storey and Julia Zimmerman, eds., *Chinese Overseas: Migratio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3-22. 原文首次發表於第二屆海外華人研究與文獻收藏機構國際合作會議，香港中文大學：2003年。
2. 有關發掘這批史料與整編的詳細過程，可以參見 Mei-fen Kuo and Tsebin Tchen, "Introducing the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Collections Onlin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4 (2010), pp. 140-149. Mei-fen Kuo, "The KMT Historical Archives in Sydney and Melbourne (1910s-1960s): A Research Note of a Historian's (and Rag-picker's) Craft",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ume 4 (2010), pp. 215-222.